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卢川,林若琴,刘建业.从荆州郢城遗址看秦朝郡城规划[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44-50.

# 从荆州郢城遗址看秦朝郡城规划

卢川<sup>1</sup> 林若琴<sup>1</sup> 刘建业<sup>2</sup>

(1.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2.荆州博物馆,湖北 荆州 434020)

**摘要:**郢城是秦朝时期建立的南郡郡城。秦人毁弃纪南城后,在秦朝城市规划思想和楚地建造技术影响下,经城市选址并确定城池位置,因地制宜,迅速修建了一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池。文章从郢城考古材料入手,介绍了郢城城市规划史实,探讨了秦朝郡城的规划过程及建城思想。对郢城规划史的初步研究,可为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郢城;郡县制度;城市规划史;秦史

**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6-0044-07

秦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人“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sup>[1](P239)</sup>,控制广阔疆土。专制王权在诸多方面得以体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sup>[1](P239)</sup>。此外,构建郡城城市体系是秦专制王权在疆域空间上的表现。

在军事和政治变迁下,东周各诸侯国都城、城邑性质得到改变,转变为秦郡城、县城等。在地理空间上,专制王权的外在表现为“都”“郡”“县”“乡”多级城市体系<sup>[2](P246)</sup>。郡官有郡守、郡尉和郡监,郡下设县,置县令或县长,辅以县丞、县尉。县下设乡,乡有三老。东周各诸侯都城虽经战争破坏,但规模较大,秦人或以部分旧城为基础,或改建征用,或择地新建,在巩固战争成果、控制全国过程中形成军事网络。对秦都城、郡城的整体研究,以徐龙国为代表。<sup>[3]</sup>

荆州郢城是秦汉时期南郡郡城,也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江陵县城,至西汉晚期,还是郢县及郢亭所在<sup>[4](P98)</sup>。随着多年考古工作的推进,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南郡郡城遗迹、遗存,为秦汉城市规划历史

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郢城是秦朝郡城典型个案,因而有必要从此入手,联系秦郡城市建设等问题进行探讨。

## 一、荆州郢城遗址的考古认知

考古上发现的秦汉城址为 620 余座。其中,大约 300 余座可确认为郡城、县道城、帝王陵邑、列侯封邑及属国都尉治城等。<sup>[2](P24)</sup>考古人员对大多数秦汉郡城遗址只进行了地面考古调查,很少进行考古发掘。

荆州郢城是经系统考古发掘而确定的秦汉城址。公元前 278 年,秦攻楚后,楚都城衰败,楚人东迁至陈,秦人于楚地设南郡。《史记·秦本纪》载,“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sup>[1](P213)</sup>。传世秦印、出土秦简均有“南郡”记载,西安相家巷发现南郡“司空”“府丞”“池丞”“郎丞”等印玺。据学者考证,南郡下设 18 个县邑。<sup>[5](P196)</sup>南郡是楚人东迁后故楚区域内的核心城市。

考古人员对荆州郢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

收稿日期:2022-07-20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郢城木构建筑及其复原研究”(21D030);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郢城木构建筑研究”(CWH202104)

第一作者简介:卢川(1981—),男,湖北松滋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城市与建筑修复工程研究。

通信作者:林若琴(2000—),女,广西钦州人,主要从事秦汉史、历史地理学研究,E-mail:3255658799@qq.com。

掘,积累了丰富的、较为系统的考古材料。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郢城考古的主要收获是一些秦汉时期盆、豆、罐、碗等生活器具。<sup>[6]</sup>同时,考古人员还多次进行文物普查,发掘了一些重要的秦汉墓地<sup>[7](P9)</sup>,由此确定这些墓地与郢城有密切关系。2012~2014 年,考古人员还在郢城周围进行了文物专题调查,又发现了大量秦汉墓地。

黄盛璋、朱俊英据考古发掘材料基本明确了郢城性质、始建和废弃年代等问题<sup>[8]</sup>。2016~2017 年,荆州博物馆对郢城城垣、城内外水系进行勘探发掘<sup>[9](P16)</sup>。2019~2021 年,郢城遗址内又相继出土数处木构建筑遗存<sup>[10]</sup>。后续研究以王建苏、尹弘兵、刘建业等为代表,研究主要集中在郢城考古材料系统整理<sup>[7]</sup>、郢城性质研讨<sup>[4]</sup>、城址年代深入辨析<sup>[11]</sup>、数处木构建筑复原研究<sup>[12]</sup>等方面。此外,郢城格局也得到初步探讨<sup>[13](P66)</sup>。这些研究利用考古材料、传世文献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逐步揭示了郢城基本历史信息。

据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现可基本明确郢城性质、年代、格局及建筑样式等问题。王建苏等人认为,郢城建于公元前 278 年,即白起拔郢之时。至汉武帝后期,郢城不再作为郡城,而是作为郢县县治。王莽时期,郢县撤并入江陵县,郢城成为郢亭。至东汉初年,郢城城址废弃<sup>[4](P98)</sup>。

经多次考古发掘,郢城遗址基本轮廓和城垣走势已较为清楚。遗存主要有城垣、护城河、夯土台基及城外墓地等。据卫星图显示,城垣轮廓较为清晰。考古实测东垣长 1380 米、南垣长 1292 米、西垣长 1402 米、北垣长 1488 米,城池面积约 192 万平方米,外护城河宽度为 26~35 米。

郢城内水系均为人工开凿的河渠,应是在郢城规划之时一并建成。河道遗存有 S1、S2 和 S3。S1 位于城内中部,由北向南,将郢城中分为两半;S2 为环城内濠,呈口字形,与 S1 在北城垣、南城垣中部交汇;S3 在城中东南部,宽度较窄,推测为汉代引流灌溉之用,并非郢城初建时所建。

郢城内有数种不同形制的道路,分主干道和次干道两种类型。郢城遗址内发现的三条道路 L1、L2、L3 中,L1、L2 为主干道,L3 为次干道。L1 在城内中部,东西走向,由东门进入折向西跨越 S1,是城东重要道路之一,残长 51 米,宽 6 米;L2 位于城内东部,南北走向,残长 654 米,宽 4 米,从南城垣东段进入,向北延伸,是城内重要道路之一;L3 规模很

小,位于城内西北角,可见残长 13 米、宽 4 米,初步推测是城垣内环城道路遗存<sup>[7](P92)</sup>。

郢城遗址内还发现 3 处梁桥和 1 处地下木构涵洞,具有楚式建筑风格<sup>[12](P128)</sup>。从水系分布情况推测,郢城东门内与 S2 水系交汇处也应有一座梁桥,形制与东门外 Q1 形制一致。此外,中部东西向道路跨越 S1 处,考虑也应有木构梁桥存在。

郢城内还发现相当数量的建筑台基。台基主要分布在城中近 S1 水系的东、西两侧,以西侧数量居多。台基形态多样,有曲尺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T12 面积最小,仅 83 平方米,T6 面积最大,为 23551 平方米<sup>[7](P93)</sup>。T6 可能是南郡郡守衙署所在地,T12 为城垣附属建筑,其余用途暂且不明。在 T3 的考古发掘中,秦汉时期遗物主要为筒瓦、板瓦、瓦当和砖等建筑材料,也有少量罐、瓮、盆、盂、釜、网坠、豆和饼等生活用器,探方中所暴露出来的建筑基底,均由陶片、瓦片垂直叠砌而成,与纪南城夯土高台基相去甚远。西城垣无城门,却为水系所环绕,建筑遗存有筒瓦、板瓦、瓦当和砖。这似乎暗示我们,此地是南郡官署分布区域。

荆州郢城遗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为我们了解秦汉地方城市规划历史提供了材料。本文在已有考古材料和已有研究基础上,对郢城城市规划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同时联系其它郡城材料,揭示秦汉地方城市规划史。

## 二、秦朝南郡郢城的规划过程

毁于秦人之手的纪南城,最早由楚官员选址,并由楚匠人根据规划方案营建。纪南城整体上西北部略高于东南部,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多以土岗、丘陵为主。在水系方面,楚人在三条自然河道交汇的区域营建城垣,使护城河与自然水系相连。朱河由北向南,从北城垣入城;新桥河从北向东南,在南城垣中部入城又折向北。两条河流在城内中心地带汇合后,形成新的龙桥河,向东流出并注入邓家湖。三条河道将纪南城分为 4 个区域<sup>[14](P325)</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郢城的选址、规划和营建过程。

纪南城是荆州一带最适合建造城池的地方。纪南城毁于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后楚人东迁于陈地。据考古材料显示,在今纪南城内,考古人员未发现秦城垣建筑遗存,但发现了汉代凤凰山墓地、松柏墓地。松柏 1 号汉墓出土简牍上,记载有秦昭襄王至汉武帝的帝系公文<sup>[15]</sup>。这些可证明纪南城毁灭后再未重建。

从秦人建城、军事防御实际考虑,纪南城被毁之后,于旧地重建城市的成本可能会更高,建城时间也更长。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证明,楚纪南城已不具备改建为郡城的可能性。纪南城的毁弃迫使秦人不得不重新择地新建城池,郢城便是秦人择地所新建的城池。

新建城池应选址于何处?这是秦人规划郢城时的首要问题。王红星在研究郢城年代时,曾据该城周边墓葬分布进行梳理。古人祭祀先祖,认为先祖有灵,所以在空间分布上,纪南城周边墓群具有一定的规律,见表 1。这直接影响到秦人选址。

表 1 楚纪南城周边主要墓群统计

序号	墓群名称	所处位置	方位距离	墓葬年代	面积(m <sup>2</sup> )
1	鸡公山墓群	郢城镇郢北村	东南 2220 米	战国至秦汉	20000
2	雨台山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北 1370 米	春秋战国	200000
3	龙会河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约 700 米	战国	840000
4	马房山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约 500 米	战国	300000
5	张家大冢墓群	纪南新区雨台村	东约 500 米	战国	450000
6	九店墓群	纪南新区九店村	东北 5370 米	战国	约 82000
7	彭家湾墓群	纪南新区枣林铺镇	北 500 米	战国	不详
8	周家湾墓群	纪南新区枣林铺镇	北 500 米	战国	不详
9	纪山墓群	纪南新区	北 6860 米	春秋战国	10000
10	黄山墓群	纪南新区黄山村	东南 4890 米	战国至秦汉	200000
11	松林岗墓群	八岭山马跑泉村一组	西南 6670 米	战国至东汉	88000
12	殷家台墓群	郢城镇郢南村三组	东南 5190 米	战国至汉	30000
13	枣林岗墓群	马山镇枣林村	西北 13350 米	春秋战国	30000
14	沙冢墓群	马山镇沙冢村	西北 7300 米	春秋战国	151300
15	大冢坡墓群	马山镇沙冢村	西北 7100 米	春秋战国	20000
16	马山墓群	马山镇沙冢村等地	西北 7100 米	春秋战国	200000
17	马鞍冢墓群	马山镇裁缝村	西北 4540 米	春秋战国	18000

资料来源:据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及相关考古资料统计。

结合上表统计,纪南城的东、西、北部都分布有大量墓葬,并无大块空地用于营建新的城池。城北有彭家湾、周家湾、纪山墓群,墓葬数量多、分布广。城西有东岳庙墓区,多为平民墓<sup>[16](P504)</sup>。城东北雨台山墓葬众多,仅 20 世纪 70 年代就清理出 500 余座<sup>[17](P2)</sup>,城东还有长江故道,水域宽广,并不具备建城条件。更重要的是,在“事死如事生”观念盛行的秦汉时期,楚人也绝不会同意秦人在先祖墓葬区营建城池。

秦人为加强对南郡的控制,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尽快建立一座可供郡守、郡尉等秦官办公和居住的城池,而新建城池又不能离纪南城太远。楚人居住范围主要是在纪南城内及城南边靠近长江的陆地上,城南郊发现大量水井及筒瓦即为明证<sup>[18]</sup>。城南分布有谢家山、杨家老屋、唐家台、朱家垵、张家台、胡家台、集台子、安家岔等遗址<sup>[19](P140)</sup>,此处地势平坦,适合人们居住和农业生产。所以在纪南城被毁弃后,秦人选择在纪南城南边陆地上重建城池。

秦朝时期,秦人在关中平原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咸阳城。秦朝掌管手工业及土木建筑的官员被称为“将作少府”,主持宗庙、宫室、陵寝等的营建。《史记·商君列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sup>[2](P32)</sup>可见秦人已具备相当丰富的城市规划技术。各诸侯国建筑技术在关中平原亦有所融合,秦人并不排斥他国建筑技术。此外,与建筑相关的手工业也在关中得以聚集<sup>[20](P37)</sup>,城市规划技术体系得到提升。

主管郢城土木工程建设的官员可能为“司空”,司空为秦廷所设。西安相家巷发现有“南郡司空”印玺,裘锡圭认为,“司空”是管理土木工程徭役工作的官员<sup>[21]</sup>。实际上,秦人的规划方案在楚地并未得到完全实行,如营建规整的方形城制等。从考古材料看,郢城遗址可见完整的围合城垣,四面城垣长度基本一致。由此可断定,营建之初,规划师应是设计为完全方形的城制,并利用“画圆以正方”方法<sup>[22]</sup>,确定四边城垣基本走向。但实际上,郢城相邻城垣段



夹角并没有呈现为 90 度,可见楚人营建的城池形制与秦人的要求仍有差距。经考古确定,西城垣为一次建成,并未见重建痕迹,这可能是出于对城池防洪的变通考虑,对原有规划方案进行了修改。

水是城市的重要因素,所以城水关系也是郢城规划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郢城所在地多为丘陵、土岗,长江由西向东流经此地,所以营建工作要考虑郢城与长江的空间关系。在郢城遗址北边不远,即为旧石器时代的鸡公山遗址,地势相对较高。经实地勘查,楚国纪南城与郢城之间有一条长江故道,在郢城南边也有一条长江故道,在两条水道之间有座高地。利用地形图、卫星照片并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勘探,我们发现在战国中期前,长江在郢城所在地极易形成分流、分岔现象,主泓确定在纪南城南侧<sup>[23]</sup>。但至战国晚期,随着地质和水文变化,长江主泓始南移至郢城遗址南侧,至西汉中期长江主泓又出现了南移。在古代,长江既是自然水系,也是重要运输水道。无论是纪南城还是郢城选址,都十分注重临江建城的原则。秦人在新城市选址上,刚好就选中这块长江边的陆地。

楚故都纪南城重视自然河道走向,并未作人工处理,体现出尊重自然、顺应地势的规划原则。郢城规划者对水系的设计却并未遵从自然。在秦人的规划下,营建了一条人工水系 S1,从北城垣中部直通到南城垣中部地下。城内发现环绕城垣的内水系 S2,又与城中部 S1 水系相通。这种在城中引水的做法,在燕下都城遗址中也有体现。燕下都城的规划者是从城北的易水引水,从城中贯穿至城南的自然水系,这是为了方便城内用水,并划分了城市功能区。<sup>[24]</sup>经过对郢城南城垣地下木构涵洞的复原研究,我们认定,这些水系互为贯通,通过位于南城垣的地下涵洞与城外护城河相连。木构涵洞南端低于北端,对城内水系起到调节作用<sup>[12](P125)</sup>。正确处理人工水渠、护城河内外的空间联系,是郢城规划者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关中秦人都城附近多以大型石材作为建桥的材料,南郡城内未见石材选用。这一方面与秦人当时政治军事情况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楚地匠人多就地取材的营建方法相关。<sup>[12](P125)</sup>

### 三、秦朝郡城规划的考古学观察

目前,经考古调查确定的秦汉城址约为 620 座,但大多未作考古发掘,整体情况不明。经考古勘探,证实为秦汉时期郡治的城址约为 14 座<sup>[2](P246~247)</sup>。

本部分对秦朝郡城的考古学观察,部分扩大到秦汉时期范围之内。

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郡城规划的主要方法是以旧有各国都城作为郡城,或将位于军事要地的城邑作为郡城,这是军事活动下对原有城市的继承和选择。对于第一种情况,因战争原因,在营建郡城时,秦人采取改建原有城池部分区域的方法。河东郡的郡城位于今山西夏县禹王城,此城分大城、中城和小城。大城面积较大,为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安邑城所在<sup>[2](P249)</sup>。中城秦汉时期遗存较集中,属河东郡治所在,中城为方形,北墙长 1522 米,面积约为 600 万平方米。

南阳郡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代表。南阳郡为秦人所置,领 36 县,在今襄阳、随州市以北、以西一带。此处为南阳盆地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军事和交通地位。秦昭王十五年(前 292 年),白起在楚国得到宛地,改为宛县。秦昭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秦设南阳郡,郡治即在宛县。从考古材料上看,该城现存有东北、南部城垣,东北城垣向西、向南延伸约 800~1000 米,冶铁遗址在宛城内东北角。<sup>[25](P141~142)</sup>

秦人所建郡城应有相应统一的城池形制,这可从部分考古材料郡城的基本情况推知。颍川郡郡治在禹州阳翟故城,城址略呈正方形,东墙长 1600 米,南墙长 1850 米,西墙长 1750 米,北墙长 1500 米,城垣四面各有缺口一处。宫殿区位于城内西北部。<sup>[26](P361)</sup>山阳郡郡治位于山东巨野昌邑,城址平面亦呈方形,东城墙长 1215 米,西城墙长 1377 米,北城墙长 1585 米,南城墙长 1720 米。<sup>[27](P192)</sup>秦郿郡郡城南窄北宽,亦略呈方形,周长 4670 米,面积 130 万平方米;济南郡城在章丘东平陵城,城址平面仍为正方形,边长约 1900 米,周长 7500 米,面积约为 360 万平方米。<sup>[2](P254)</sup>由以上考古材料可见,秦郡城城池均近方形。

从考古上所见郡城的城内遗存来看,似乎也在效仿咸阳城内部的布局形制。秦咸阳城手工业遗址主要包括制陶、冶铸和制骨遗址等,主要分布在咸阳城西部、西南部。<sup>[2](P43)</sup>秦时手工业分为中央、市府和民营三大系统。官署手工业遗址主要有冶铸和制陶,分布在宫殿遗址区西部;市府和民营作坊分布在西南部。从手工业遗址分布来看,有一些郡城似乎具有同样的区划分布规律。如秦济南郡,在该城城内西北部一带,就发现一些有铭文的器范,可能是冶铁作坊区所在地。

从目前考古情况看,南郡郢城手工作坊遗址也可能处于郢城内西侧。楚纪南城的手工作坊、冶炼区,也在城内西南部。在南郡郢城考古发掘过程中,东门外护城河上建有宽大梁桥。梁桥宽度设置基本符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载“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的标准<sup>[12](P124)</sup>。城中部一带还发现两座梁桥,跨越不同水系,连接不同区域,且与东门梁桥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南郡与秦咸阳甚远,但作为择地新建的郡城,城内区域功能分布既体系了楚人城市布局传统,也符合秦人郡城规划意图。这一切还需要新的考古发掘材料进行证明。

#### 四、秦朝郡城的规划思想分析

郡城是秦朝对全国进行控制的军事据点和交通中转站。秦灭六国后,面对随时可能反扑的旧贵族军事力量,必须要加快郡城建设。基于南郡郡城的城市规划,以及在考古材料认识基础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秦朝郡城的规划思想主要包括:因循传统、快速简便及注重军防三点。

##### (一)因循传统

方形城制的选择是对传统城市规划知识的继承。《周礼·考工记》实际是对匠人营建城市知识体系的归纳<sup>[28]</sup>,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所谓“方九里”,即反映周礼所规定的城池形制。道路相交,城门相对,空间布局具“方型根基”特征<sup>[29]</sup>。为了达到这一规划目的,规划师需要“画圆以正方”,这正是古代规划者确定城市形制的规划手段。《周礼·考工记》无论是成书于战国初年<sup>[30]</sup>,还是成书于西汉之初<sup>[31]</sup>,均反映了战国至秦汉之际城市规划建设传统。

关于秦城内护城河的营建,秦咸阳城城墙内外均建有城壕<sup>[32](P12)</sup>,秦雍城在城墙内侧也修建有平行沟壕。这种内外护城河的营建手法,在择地新建的南郡郢城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展示。田亚岐研究雍城布局时,提出秦人有“城堑河濒”的规划方法<sup>[33]</sup>,秦人不仅善于以水围城形成防御体系,同时也有引城外河流进入城内的做法。以壕沟来加强城池防御,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环境设计。新石器时代的南方、北方的城池,如屈家岭遗址、走马岭遗址、兴隆洼遗址、姜寨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多都有环壕设计。<sup>[34](P342)</sup>

古代都城往往规模巨大,且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如秦都城或许存在“天人合一”等内在规划思想和象征意义。但对于战时所建郡城而言,似乎并没

有充足的时间去体现。许宏认为,古代地方城市在文化面貌上,与同时期王朝文化有一致性,区域性中心遗址与王朝都城有密切联系<sup>[35](P77)</sup>,这主要针对长时期的城市规划而言。秦朝地方城市的规划手段、营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各地建筑风格,并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性。从整体而言,修建郡城仍是一种军事行为,更重视城市的军事功能。

##### (二)快速简便

从考古材料看,郢城夯层厚度为 0.15~0.2 米,营建质量不如秦都城。就秦雍城、咸阳城夯层而言,为加强防御,人们对墙体进行中、里、外重叠加筑,整体厚度为 8~14 米不等。虽然都城与郡城在等级上有所不同,但身处楚地中心的秦国官员,不得不对楚人心存防范,且秦置南郡之后,楚人一直也有反攻之心,如《史记·秦本纪》中可见“楚人反我江南”<sup>[1](P213)</sup>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楚匠人早已具备城市规划建设的知识体系。《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国土木工程由令尹亲自主持,具体由“司徒”之官实施规划工作,工程分为“量功命日”(确定工期)、“分财用”(费用预算)、“平板榦”(准备版筑工具)、“称畚筑”(厘定容量工具)、“程土物”(计算取土工具及材料运距)、“略基趾”(勘测城池工程边界),此后开始营建城池工作。可见楚人筑城规划的经验和技术十分完备。<sup>[36](P221)</sup>郢城在营建之时,楚匠人工程组织也应基本是这样的过程。

另外,郢城城垣底部并未开挖基槽,而是直接在生土层上营建城垣。基槽工程做法在郑州仰韶文化时期西山城遗址中就已使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期城址也有此工程做法。战国时期纪南城北垣东段,工程上也是在基底下先开挖基槽<sup>[16](P328)</sup>。对于楚地土质松软之事,秦人到达楚地之时可能不太了解,但楚地匠人却不可能不知。由此可见,秦人为尽快营建好郢城,甚至省去了“开基槽”工程做法,这使得郢城使用年限并不长,后来迁至峨峨山也可能与营建质量较差有关联。快速原则还体现在具体的一些城垣数据上。郢城平面为不规则方形<sup>[7](P16)</sup>,其四边城垣长度、面宽、底宽及高度,均未达到统一建设标准,见表 2。

由以上数据对比,结合郢城建设时间,可以看出郢城营建不仅省去很多基本的营建步骤,且与规划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应是快速、简便建设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在秦人占领楚都之后,秦人要求楚地匠人以最快速度营建城池,本应是四方之制城池,

但在城垣面宽、高度方面均出现了一些误差。

郢城南城垣中部并没有实际开设城门,而是作为城内外水系重要连接处,这也是规划者临时的思考与变通。2020~2021 年,荆州博物馆对此处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深埋于城垣之下的地下木构过水涵洞。经分析,木构涵洞的工程做法与楚地墓葬檸室做法基本一致。<sup>[12]</sup>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速度,楚地匠人是在生土上直接铺设木条,并形成地下水道,于上

再进行夯土回填。由此可见,楚地匠人一体兴建过水涵洞、城垣,以及城中部、城东门外简易木构梁桥,都是重在解决城内居民用水、城内外交通便利问题,似乎并不重视城门数量、宏大桥梁所带来的政治象征意义。本应以南门为正门,而实际却是以楚人所看重的东门为正门<sup>[12](P128)</sup>,这自然是因地制宜的表现。

表 2 郢城城垣、拐角、护城河数据对比(长度单位:米)

	城墙				拐角 度数	护城河		
	长	面宽	底宽	高		口宽	底宽	深度
北垣	1488	8.3~12	25.1~30.2	4.4~5	西北 78 度	/	/	/
西垣	1402	10.5~11.2	25.4~30.1	4.1~4.67	西南 103 度	28~30	26~27	1.8~2.4
南垣	1292	6.3~11.2	25.5~30.2	4.8~5.6	东北 95 度	26~35	24~32	1.4~2.5
东垣	1380	9.5~11.1	25.4~30.1	4.6~5.25	东南 85 度	26~30	21~28	1.6~2.7

资料来源:笔者据郢城考古材料推算。

郢城西城垣上经过密集勘探,仅发现了现代农业生产时所开挖的排水沟,并未见城门遗址。对缺口附近断面进行地层分析,第 3 层有多个亚层,均为夯筑而成,夯层厚度基本一致,且城垣夯土中均含少量泥质绳纹板瓦残片,可见是同时期所制作的夯土。<sup>[7](P53)</sup> 由此推断,西城垣并没有城门遗迹,且护城河和 S2 走势也与城垣倾斜度一致<sup>[7](P64)</sup>,营建之初即建成完整城垣。研究者认为,西城垣不设门,还可能与秦人阻止楚人西望故乡相关<sup>[13](P83)</sup>。秦朝国祚甚短,战争不断,或许没有充足时间考虑控制楚人的思想,军事防御才是城市规划的首要因素。前已述及,战国中期至晚期,今郢城遗址所在地长江分流、分岔现象比较严重,长江整体由西向东贯流。长江洪水期之时,长江故道和新道可能会连成一片,对郢城造成极大灾害压力,西城垣倾斜也自然是为了减少洪水对城垣的直接冲击力。郢城西门不设门,应是楚匠人在了解楚地水文基础上的变通做法,节省了建城工期。

（三）注重军防

从自然河道到人工水系,以快速便捷方式进行分割区域,首先应是出于加强军事防御的考虑。在都城规划上,秦人不仅重环境、经济,还尤重军事<sup>[37]</sup>。在考古上发现的纪南城水系已较明确,它是数条自然水系的汇集。郢城城址内发现的三条水系,S1 为由北向南的人工水系,S2 在城垣内侧环绕全城并在南、北城垣中部与 S1 贯通,内外水系与城垣形成多重军事防御体系。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

S3 是否为秦人营建郢城时同时修建,或为入汉后修建。从形态来看,城东南角围合成一小块区域,南城垣东段上似有陆门存在,此小块区域或许是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亦或是出于农业灌溉目的,这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勘探才可证实。

多重水系防御模式,应是秦人加强军事防御的基本规划手法。前已述及,在秦雍城考古中,发现秦人有以水御敌的做法。秦汉之际的渭河之上,因水系在军事防御上有重要作用,秦人多以大型石材、木材营建跨河桥梁,一是便于通行,二来也方便防御。

郢城作为秦人择地新建的军事城市,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四角应建有角楼。古代角楼一般为土木建筑形式,后世角楼有曲尺、长形或方形之制,用于弥补城垣转角的防御功能。楚纪南城城垣转角,处理为抹斜角,也是出于扩大军事防御视野范围的考虑。在郢城城垣东南、东北以及西北角,我们发现了 1.5~2 米的圆形台基,虽因保护较差,郢城城垣西南角上台基已被现代农业活动所平,但现存各圆形台基直径约为 24~26 米,具有相近建筑基底面积。从高度来看,这些台基高出城外地面约 5~6 米,体现出很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从城垣剖面来看,城垣内坡大多平缓,而外坡则显得较陡。<sup>[7](P19~30)</sup> 2022 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东城垣南段进行保护修缮,城垣剖面呈现出内外坡均较平缓的城垣形态。楚人“都郢而强”,以纪南城为都城之后,楚国境内少有战争发生,故楚人并未强调城垣的军事防御功能,外坡显得较



陡,实际起到减少洪水侵蚀的作用。郢城城垣设计为外陡内缓,功能则从防水转向了防兵。

五、结语

郢城作为秦人所建南郡郡城,位于纪南城东南不远。秦人毁城、建城的城市规划过程,符合秦国政治、军事实际情况。从城市规划史角度来看,郢城规划不仅反映了秦人对军事防御的根本需求,同时还反映出先秦城市规划知识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延续,并使南方城市具备了更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郢城是秦朝郡县制度下所催生的城市,上承战国城市,下启汉代城市,具有重要规划史价值。以郢城为中心,联系秦朝其他郡城历史,可见秦人在规划过程中所采取的规划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建旧有诸侯国都城部分区域作为新城,二是择地新建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池,以供秦人管理。因此,在此规划过程中,内在因循旧制,外在注重军防,同时还讲求快速简便,这与当时军事活动频繁的史实相关。

郢城不仅在时间上接续战国至汉代荆州城市发展脉络,同时维系了纪南城和后世峨眉山古城、荆州古城之间的空间联系。在未来学术研究中,我们将更深入地联系纪南城、郢城、峨眉山城及荆州古城空间变迁动因、过程及影响,联系长江水系变迁,更好地揭示荆州古代城水关系、人水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仍实行郡县制,这是“汉承秦制”最直接的表现。后续研究还将进一步结合秦汉郡县制变迁、城市规划变迁,结合传世文献及郢城考古,探析战国至秦汉之际中国南方城市建设、规划和发展脉络,由南郡出发,纵向、横向把握秦汉郡县制对中国后来古代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结合现实来看,在历史、城市和地理多重视野下,现代城市建设应尽可能避免破坏历史城市的空间变迁脉络。对郢城的城市规划研究,不仅可以深化秦朝城市规划研究,同时还可作为荆州不同时期古城的联动保护提供科学的依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王建苏,刘建业,王潘盼,等.郢城遗址的年代与性质新证[J].江汉考古,2020(3).  
[5]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西部考古(第4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6]江陵郢城考古队.江陵县郢城调查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91(4).  
[7]荆州博物馆.荆州郢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8]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J].文物,1974(6).  
[9]朱岩石.考古学集刊(第21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0]刘建业,李莉,朱枫,等.湖北荆州郢城遗址秦汉木构遗存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22(1).  
[11]尹弘兵.郢城遗址性质辨析[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12]卢川,刘建业.荆州郢城遗址秦汉木构建筑遗存及其复原研究[J].江汉考古,2022(2).  
[13]贺云翱,郑孝清.中国城墙(第3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14]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J].考古学报,1982(3).  
[15]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4).  
[16]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J].考古学报,1982(4).  
[17]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8]向德富,向会斌.纪南城南郊布局探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9).  
[19]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22.  
[20]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1]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J].历史研究,2011(4).  
[22]武廷海.画圆以正方——中国古代都邑规画图式与规画术研究[J].城市规划,2021(1).  
[23]王红星,朱江松.江陵城、南郡城、荆州城辨正——以考古资料为中心[J].历史地理研究,2020(2).  
[24]李国华,郭华瑜.燕下都遗址的城水格局研究[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12).  
[25]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6]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27]鲁文生.遗址[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28]武廷海.《考工记》成书年代研究——兼论考工记匠人知识体系[J].装饰,2019(10).  
[29]郑孝燮.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特点和风貌的保护[J].建筑学报,1983(12).  
[30]郭伟川.《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31]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3]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3(5).  
[34]梁安和,徐卫民.秦汉研究(第13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35]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36]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37]赵安启.论秦汉城市选址及其规划思想[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1998(2).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